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与政治和谐探求

库德华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政治和谐是政治学论域与范畴中学术研究以及我国政治实践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亟待开拓和创造。政治和谐不仅是一种理想追求, 更是一种现实选择, 正视政治和谐、研究政治和谐, 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丰富的“和谐”思想, 也包含着古人们对于政治和谐的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政治和谐理念的源起,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研究和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历史上按照是肯定还是超越现实政治关系的政治和谐追求特点, 出现了两条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和谐追求思路: 消极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和积极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

**关键词:** 和谐; 政治和谐; 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1-0006-05

## A Search for the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s

KU De-hua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Now that Political harmony is the weaker domain and scop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China, it is i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and create. Political Harmony is not only an ideal, but also a realistic choice and thereby i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address and study political harmony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s well as realiz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ly, Chinese culture gave birth to the concept of harmony, which includes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harmony of our ancestors.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race back to the political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study and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harmony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features in the political pursuit of harmony (affirming or surpassing the political reality) there appeared two thinking threads in Chinese history, namely, the passive romanticism and the active realism.

**Key words:** *harmony; political harmony; romanticism; realism*

收稿日期: 2009-12-28

作者简介: 库德华(1982-), 男, 山西大同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助教, 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大社会剧变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秩序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决定了编织种种理想社会蓝图以追求至善的澄明之境,构思种种制度设计以规范权力的有效运作,成为诸子百家的鲜明思想特点<sup>[1]</sup>。按照是肯定还是超越现实政治关系的政治和谐追求特点,就出现了两条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追求思路:消极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和积极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

## 一、道家的消极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

从先秦老庄思想发展出战国秦汉的黄老思想,两者后来被合称为道家;从黄老思想衍生出汉晋时期以黄老为旗号的民间新兴宗教运动,最后整合为道教,及至后来发展的魏晋玄学。他们都追求某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是为广义的“道家”。道家所向往的是一种朴实无华、清静无为、波澜不兴的社会,也是一种消极和谐的社会。

### 1. 老庄学派的政治和谐思想

《老子》从“王法自然”的政治哲学观点出发,得出了以“少扰民与愚民”为核心观点的无为政治论。在《老子》看来,人们的“有争”、“有欲”、“有智”、“有身”、“熙熙”、“昭昭”、“察察”等行为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只有把这一切祸源铲除,才能把人们从有为之路拉到无为的道路上来。为了重建和谐,《老子》倾向于复古,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出发,引申出更具浪漫色彩的无治理想——“无何有之乡”,又称“至德之世”:“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雀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

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君子小人哉!”。庄子所说的“无何有”并不是连人自身也不要,而是指取消人类的社会性生活与交往,其中国家、政治、权力无疑是首先应该摒弃的,君主清静无为,个人各顺其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权力与自由的绝对自由境界。

### 2. 黄老学派的政治和谐思想

产生于楚地的老子之学,大致到战国早中期,在齐国分化出黄老之学。黄老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的100多年间,特别是汉文帝和景帝统治的时期。西汉初年,一则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重创儒家,二则因中国经六国及秦楚之长期战乱,天下困穷达于极点,而老庄的“无为而治”正合休养生息之策,因而汉初由“养生”改为“治世”,由“为我”改为“临民”,以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减免苛刑、节约皇室与国家开支、少修土木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黄老之学盛行于朝,甚至有压倒儒法,独为国教之势。但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具有新的特点。黄老学派原则上继承了老子柔弱不争的思想,但也有所调整,对刚强和斗争并不完全否定,“是故君子卑身以从德,知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经法·前道》),“道同者,其事同;道异者,其事异。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勿争乎?”(《十大经·五正》)。黄老学派还主张依法治国,但法应该以道为基础,并受道的指导,“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它给法的权威性建立了形而上神圣基础,同时也规定了法对于道的从属地位。“道不足以治而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尹文子》)就是说,法是道被败坏以后不得已的选择,法治的最高目标是重返于道,即消除不法的根源,以致无须用法,重现“道行于世”的境界。黄老学派克服了老庄学派过分强调一致性的消极保守倾向,保留了老庄道家尊重自然、拒绝过度作为的系统

辩证观念,汉朝初期采用黄老思想造成的相对和谐的社会发展局面,频频受到后人的称美。

### 3. 道教及玄学中所含的政治和谐思想

一方面,东汉后期,道家对自然神秘化的因素被民间极度强化,进而成为一个宗教神学思想体系——道教,完成了道家向道教的宗教化转变。当然,道教毕竟不是道家,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的密切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深受儒家“道德教化”观念的影响。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所以,道教的政治和谐思想总体上大致是道家与儒家的政治和谐思想的糅合,只是在不同时代,或不同的派别,所强调的方面会有所不同。例如,南北朝隋唐时代,道家追求雅化,其价值取向,是将入世与超世、集体秩序与个体发展结合起来,但超世和个体发展是主导的方面,“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谓之小成也。世薄时浇,唯行仁义,不能行于大道,故言道隐于小成。而道不可隐也,故老君云:‘大道废,有仁义。’”(《齐物论疏》)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华北勃兴,以清净及炼养之说见长,志在与庸俗化的宋朝道教分道扬镳。其时华北地区长期遭受塞外游牧民族的严重侵扰,大唐繁华荡然无存,汴宋文明也已湮灭,女真人逐渐文明化的成果尚未来得及被汉族民众认同,更加狂悖的蒙古铁蹄又已向更广大的世界席卷而来。全真道全力投入丧乱时代的伦理重建。丘处机以古稀之年不远万里奔赴西域大雪山,以敬天爱民之义进谏成吉思汗,创造了“一言止杀”的佳话,为极度混乱的社会多少注入了一些和谐的因素。全真道的政治和谐思想并无超出以往传统,他们只是融通诸家之长,更加灵活,有巨大丧乱所触发的更深切的生命感悟,以及更笃实的实践工夫。而另一方面,道家相对消极的思想经东汉王充更为悲观的绝对化推进,到魏晋时期,阮籍、陶潜、鲍敬言发无君之论,无为思想逻辑上的必然结果终于成熟,进而成为玄学的开端。在阮陶鲍三人之中,又以鲍的无君之说更为激切,更为极端。一则,他

大谈无君之乐:“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抱朴子·诘鲍》)二则,“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夫獭多而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抱朴子·诘鲍》)人类无穷的苦难随君立而起,因此两相对照,不言而喻,“古者无君,胜于今世”。鲍生的无君论虽师承老庄,原则上无甚创新,但他对秦汉数百年以来尊君传统思想的空前抨击,却是前无古人的。

## 二、儒墨法家的积极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

“苛政猛于虎”,不独老子忧之,孔子亦思为之拨正,老庄视之为“有为”而于事无补,但儒墨法等家却欲积极救治以仁义忠孝之德、礼乐制度之文。与老庄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相比,更值得研究与梳理的是孔子开创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在这条追求路径中,不仅有解释世界的思想的灵光,更有改变世界的制度的设计,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积极政治和谐与消极政治和谐、传统政治和谐与现实政治和谐的相异,因而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和谐发展的主线。儒墨法相比于老庄更为关注现实,注重政治实践,因而更具有政治理性,由于治术的特点不同,同样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和谐追求,又有伦理型和法制型之分。

### 1. 伦理型政治和谐,以孔孟的儒家思想和墨翟的墨家思想为主要代表

伦理型政治和谐把天下治乱看作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相信依靠圣人、明君的设计,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来,社会发展之道不在社会的自然演化中,而在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心中。这一政治和谐追求思路试图通过伦理世界的改变,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因而提升伦理精神,将复杂的社会纳

入家族与宗法之中,把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被固定在人伦纲常的伦理框架中,把伦理问题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成为这条追求思路的主要特点。伦理型政治和谐集中体现在孔子提出的“美政”、孟子提出的“仁政”和墨翟的“兼相爱”思想之中。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在这里,孔子通过对惠和费、劳和怨、欲和贪、泰和骄、威和猛这五对矛盾或近似关系的论述,表明了其政治和谐思想,即处理政治关系中,应寻求适度点,把矛盾对立的关系转化为和谐关系,把相近的东西加以区别,这样才能使矛盾双方既得到节制,又得到适当的满足<sup>[3] 54</sup>。这里,实际上包含了孔子中庸的政治和谐思维。孟子秉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以性善为出发点分析了人的本性和变异以及社会矛盾,并引出了“仁政”之说。孟子的“仁政”包括给民以“恒产”、赋税徭役有定制、轻刑罚、救济穷人和保护工商等内容,核心思想是主张以仁政立国<sup>[3] 76</sup>。孟子认为国之兴衰有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内因在政策,政策在是否行仁政。“天下溺,援之以道”,说的就是要从“道”,从政策入手才能有效治理国家,所以国家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实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曾经和孔子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子学时代应该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与墨子算起的,……自孔、墨起,中国古代思想史才算真正进入了划期的时代,即所谓‘私学’”<sup>[4] 40</sup>。两千多年来,不管是褒是贬,任何研究者只要提到墨子的思想,最关键的断语“墨子贵兼”必不可少。兼,就动词言之为兼顾兼覆,截长补短;就名词言之,则是无所偏废,共有共赢。动、名结合,略指由墨子所倡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的政治和谐理念<sup>[5] 87</sup>。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陷入不堪收拾的乱局,根本原因就是“天下之人”没有建立共同准则,是“亏”对方以“自利”基础上的“不相爱”在作祟。其具体表现就是处在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甚至同辈、同级关系中的每一人都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对方、爱别人,于是:“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兼爱中》)。墨子也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

## 2. 法制型政治和谐,以商鞅、韩非子等人的法家思想为主要代表

法制型政治和谐,是指对政治和谐的追求应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不是个人内心道德修养,以严明法令、严刑重罚为治国要素,力求通过专用刑罚之械数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政治理想设计。法制型政治和谐的贡献主要在法律制度,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因而现实性与实践性均强于伦理型政治和谐。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如果说儒、墨是先秦时代思想学术的“显学”,那法家可以说是思想学术上的“新学”,在政治上也可说是独步天下。先秦儒墨法三大积极求治学派中,法家成立时间最晚,但最具积极乐观的开国气象,它一洗儒墨中庸柔顺和平谦虚之风,而以尊君重国、富强进取为务<sup>[6] 116</sup>。先秦尊君重国思想到战国时期的李悝、尸佼、慎到等人已有简约表述,在这之前的春秋《管子》也提出过以法治国思想,“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生法者君也”,但严格的法家思想是在商鞅之后成立,由韩非集大成,这二人不仅思想内容客观,而且尚存的文献资料最丰富。尤其韩非从人性恶且没有变善的可能,私人道德与政治需要互不相容这一认识出发,摒弃道德于政治范围之外,综合慎到、申不害和公孙鞅三家思想,以君势为体,以法术为用,再参照黄老的无为思想,弃德专刑,创立了最完备的法家思想系统。商韩认为,人君发号施令老百姓之所以会服从,不是因

为他是圣人贤人,而是因为他是君主,如果百姓以法令者的品格来决定是否遵令,则命令本身就失去威权了。推到极致,则社会将只有道德制裁而没有政治命令。“桀为天下,能制天下”是因为桀有人民公认的权力,而“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是因为只有道德命令,没有政治命令。所以不管君主行为如何,君臣都应无条件服从,势治是君主专制最合逻辑的理论。商韩认为,要实现以法治国,一靠立法,二靠行法,因而重刑,“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子·画策》)。商韩重刑说虽有所偏激,但却内含近代法律平等原则,尤其是商子主张“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这与封建天下时法律之议亲、故、贤、能、功、贵等事而驰减刑罚根本不同。商韩认为,虽应固定明确的制度,但绝不能守旧,相反,他们深知社会演变的道理。《商子》曰:“圣人之为国者,不法古,不修今,

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韩子》曰:“时移而法不移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家积极求治的思想由此彰显。

“和谐”这个从古至今人类始终怀揣的美好愿望,人类一直对它孜孜以求,追求和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样政治和谐的追求也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和谐追求所蕴含的理念非常丰富,它体现着政治和谐的追求绝不是一个阶段性活动,它也决不能一蹴而就<sup>[7]3</sup>。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和谐构建过程中,随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我们的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始终持有追求和谐的热情和信念,用耐心、细心、决心和毅力排除政治不和谐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张雪梅.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和谐的追求[J]. 政治学研究, 2007(1): 107-108.
- [2] 朱贻庭. 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 [3] 田广清. 和谐论: 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 [4]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5] 赵凡. 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刘慧恕. 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7] 王伦光. 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构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77-79.